

近代上海的興起

1843—1862

• 朱 弘

歷史要素：關於上海的興起

上海的崛起，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奇迹」。關於這一「奇迹」的發生，中外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過許多深入的研究。下擇幾例：

洛茲·墨菲(Rhoads Murphey)的著作《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是一部經濟地理學的著作。但此書的獨特之處，也正是從地理學的角度，審視了上海在現代人類社會中所擁有的無以倫比的優良條件，特別是在九大重要航道之間的要衝位置①。

《劍橋中國晚清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的作者們，注意到了在晚清國家政治制度衰敗、西方列強向中國拓展勢力範圍這一矛盾激化過程中上海的特殊地位，尤其強調了「條約制度」的存在。事實上，他們認為，上海是西方文明在東方世界所創造的奇迹②。

樂正的研究則提醒人們要充分重視近代上海社會的人文因素。在《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一書，他剖析了近代上海城市發展與「上海人」群體形成之間的相互關係③。

如果說，上面例舉的幾種研究成果大都是以「上海」為研究基點的話，那麼，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其他的研究方式。例如，從國際環境的變化發展探討上海的發展契機；從航運、土布織造等專業的角度研究它們對近代上海發展的影響……④。

我認為，上述所有的研究都是極有意義的。實際上，近代上海的崛起也正是若干歷史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應該指出，研究者又往往忽略了兩個基本問題，即：近代上海崛起的標準是甚麼？近代上海崛起的過程又是如何演進的？

中外學者對上海的崛起進行過許多深入的研究。但他們往往忽略了兩個基本問題，即：近代上海崛起的標準是甚麼？近代上海崛起的過程又是如何演進的？

對於一個普通城市來說，我們比較容易用若干客觀的標準來界定它發展的主要階段，例如城市規模、居民人數、社會生產力……；但是，對於上海的研究，如果光停留於這些層面便顯得不足。這是因為，近代上海除了自身的發展以外，還對中國、遠東乃至全世界都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所謂近代上海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上海的歷史地位。因此，我認為，要判斷近代上海的崛起與否，主要決定於以下幾個因素：一、近代上海城市規模的確立；二、近代上海經濟地位的確立；三、近代上海在中外關係和國際關係中「橋樑」地位的確立；四、近代上海社會發展大勢的確立。

事實上，在上海歷史的演進中，這些因素又是彼此交織、相互影響，並發揮作用的。順着這一思路，本文將在以下關於近代上海崛起過程的論述中，將重點放在各種歷史要素的相互關係上。

為了便於使用不太多的文字來闡述我的觀點，本文從幾個充滿矛盾衝突的年份着手，它們包括1843年、1853年、1862年……。

五口通商與上海開埠

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將1843年視作近代上海的開端。原因很簡單，在上一年度簽署的〈中英江寧條約〉中，上海與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共同被闢為通商口岸^⑤。這年11月17日，英國人巴富爾(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正式開埠^⑥。

從1843年以後上海歷史的發展來看，前面所提到的觀點，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從開埠這一事實發生的十九世紀40年代初來看，似乎中外人士都還沒有把握到未來上海將擁有的地位。

我認為，對於整個西方世界來說，對於上海——一個新的北方(相對於廣州的地理位置而言)開埠港口——的選擇，既是精心的又是含糊的。

就前者而言，從1836年起，西方人在對中國北方沿海的考察中，就開始窺探上海，並進行過多次的實地調查，甚至在十九世紀初年已有人比較精確的標誌了上海縣城的緯度^⑦。

就後者而論，〈中英江寧條約〉所議定的五個通商口岸，顯示了英國欲向中國腹地發展的總體戰略態勢。其基本的依據，來自「印度和中國協會」關於開放中國沿海口岸，尤其是北緯29°-32°之間的長江口和杭州港地區的建議，至於具體的城市，目標並不十分明確。與上海幾乎以同樣的原因入選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的寧波，在以後就沒能迅速發展起來，而上海的發展，則多少出乎人們所料。原因何在？

在上海獨特的自然歷史條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有以下幾方面，它們顯然與中國其他城市有着重大的差別：

一、1403年，吳淞江在夏元吉的領導下得到治理，形成了一個天然的世界超級良港。二、1684年，康熙皇帝同意上海開放海禁^⑧，使上海成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內、外貿港口。三、自元代黃道婆傳播棉紡織技術以來，上海及其周

〈中英江寧條約〉所議定的五個通商口岸，顯示了英國欲向中國腹地發展的總體戰略態勢。至於具體的城市，目標並不十分明確。與上海幾乎以同樣的原因入選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的寧波，在以後就沒能迅速發展起來，原因何在？

圍地區已取得了「衣被天下」的地位。四、綿延數百年的生活環境，構造了上海民風中善於海上貿易、敢於發現新事物以及勇於競爭等特性。

到了1835年，終於有一個英國傳教士發現了這些獨特現象：「上海雖然只是一個三等縣城，但卻是中國東部海岸的最大的商業中心，緊鄰着富庶的蘇、杭地區，上海的貿易即使不超過廣州，至少也和廣州相等。」^⑨他的同胞還曾說過，上海是「一座買賣的城市。它是為這個目的而建立起來的，而買賣始終是它的主要特徵」^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的開埠就顯得與眾不同。

由於上海的獨特性，當它成為受到關注的一個城市以後，自身所擁有的各種條件，迅速地適應了時代的需求，並以此為基礎，走上了幾乎讓人矚目的發展道路。1858年底，因事來到上海的欽差大臣桂良已在奏疏中寫道：「上海地方，城外東北兩面江岸，全係夷人房屋。」^⑪何以令其佔據地面如許之多，又兼處處扼要，實不可解。」咸豐帝也頗感意外，因而諭令「詳細繪具圖說」，以便讓他「了然於胸」^⑫。

因此，從這一角度來分析，上海開埠不僅是一個面向未來的行為，亦是對歷史的總結。儘管這種總結在列強與中國來說並不是完全有目的的。

1853年後的上海城

1853年是小刀會在上海起義的年份。而這一年在近代上海崛起的歷史過程中，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這一年後，上海的進出口總額已從與廣州齊頭並進而超過廣州，一躍成為中國對外的貿易中心^⑬。據英方記載，在1854年，外國租界中「儲存着約值200萬英鎊的財產，同時進行着將近400萬英鎊的出口貿易」^⑭。據中國學者的研究，1853年上海與廣州的對英貿易總額分別為1,050萬美元與1,720萬美元^⑮。

之所以發生這種重要的變化，有賴於當時中國社會發生的幾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洪秀全領導太平軍起事。儘管起事的地點遠離上海，但他們的行動卻成全了上海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內地物資最大的輸出港：在太平軍與清軍作戰期間，整個絲、茶業從江浙到廣州的陸路運輸幾乎都被戰火所阻隔，商人自然將目光轉向開埠之初的上海，儘管這裏曾被小刀會佔領了一年的時間。

「租界」的設立也值得一提。自1845年巴富爾與宮慕久達成協議之後^⑯，上海成為西方人士在中國最大的居住地。與廣州、福州等地華洋嚴重對立的局面相比較，上海簡直可稱為洋人「安居樂業」的天堂^⑰。因此，上海迅速出現了一些歐、美商人開設的各類洋行。除了上海與內地、沿海的傳統航線以外，上海與香港的航運也在這期間開始，此舉不僅連接了英國在遠東最重要的兩個戰略據點，實際上也成為上海溝通東方與西方最早的通道，在這種情況下，上海的貿易迅速發展就不足為奇了。按照「條約制度」，租界也成為清帝國版圖上一個政治、經濟「特區」，並為其後各種發展提供了一個便於施展的舞台。

自1845年巴富爾與宮慕久達成協議之後，上海成為西方人士在中國最大的居住地。與廣州、福州等地華洋嚴重對立的局面相比，上海簡直可稱為洋人「安居樂業」的天堂。

「海運南漕」是易於被忽視的一個問題，而實際卻影響甚廣。道光初年，蘇北運河淤塞，海運南漕勢在必行，在這一背景下，上海港的地位得到鞏固。因為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性貿易港口，而是可以直接威脅清帝國統治的穩固。從這一前提出發，清政府給予上海前所未有的重視。其中一個重要的措施，便是將「分巡蘇松兵備道」由蘇州改駐上海，而此後，上海縣令在上海的管理事務中便不再具有甚麼重要作用了，上海的行政地位實際上卻是升了格。由於從1853年以後，上海已將「五口通商」衍變為獨有的「專利」，從這個角度說，這種「升格」也是必需的。

上述大事的綜合影響，使得1853年以後的上海，在政治、經濟事務中有着與傳統迥異的格局。最重要之處，便是上海所發生的事件往往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幾乎每次都會引起國際上的強烈反應。正因如此，上海也越來越多地捲入國際事務之中，甚至有學者作出這樣的判斷：與其說上海經濟的命運與中國經濟的命運緊密相關，倒不如說上海經濟的繁榮更有賴於世界經濟的局勢。儘管這樣的論述多少有些偏頗，但對於理解當時上海城市經濟的特徵不無益處。

上海：通往世界之橋

1853年以後的上海，已經比較穩固地確定了它在中外關係中的重要地位。而對於西方世界來說，上海更是他們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跳板。例如，在1853年，英國在上海的產業已經達到2,500萬英鎊，約合7,500萬兩白銀。而在這些產業中，貿易所佔的份額在90%以上。

所以，當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外貿中心以後，西方諸國的行為，都自覺、不自覺地為這個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增添了動力。

1859年，英國把駐華商務總監、駐華公使館從香港遷到上海。英國政府公開宣布：「英國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①英國把上海作為向中國腹地進行輻射性擴張的起點，從這裏張開搜刮中國脂膏的巨網。用巴富爾的話

不尋常的政治氣候，造就了不平凡的城市。上海市內華洋混雜，卻能相安無事，乃其他地方所無。



說，就是：「我們的政策是徹底支配這條大江（指長江）。」^⑩因此，絕大多數英國商行、銀行都選擇上海作為基地。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之，這使上海很快成為中國的商業、金融中心。

在太平軍與清政府軍作戰時期，長江上沒有一艘中國商船，而當太平天國向英、美等國宣布「保護洋商在長江上的航行」以後，頓時引來了世界各國的商船，上海出現了世界近代航運史上罕見的奇觀。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從上海至漢口的運輸利潤，居然要比從上海到倫敦的高出四倍。而當一批又一批大輪船駛進上海港以後，也給上海近代造船業的崛起帶來必要的條件。從蒸汽機開始，上海開始了一場在中國大地前所未有的「工業革命」，甚而我們還可以發現若干生產關係變化的痕迹。從這個角度來說，上海已從一個貿易的城市，走向了多元化的城市。《北華捷報》在論述這種變化時，曾說到：「現在我們既是居住在一個大的商業港口，同時也是處在一個大的工業城市之中。」^⑪這保證了上海在發展進程中，由於其經濟多元化的構成而呈現的穩定性。

十九世紀50年代以後，西方諸國在上海取得比較穩固的地位，便立即開始了以上海基地向太平洋擴張的行動。用他們觀點來說，正是在上海開埠以後，才真正地打開了世界的東方大門，世界才真正進入太平洋時代。到1858年，外國航運勢力在上海港已開闢了三條外貿航線：上海—香港，上海—香港—加爾各答—歐洲，上海—紐約^⑫。此外，另有一部分船只往來於中國和澳洲、南洋各國之間。經營的洋行包括英國的寶順、怡和洋行，美國的羅素輪船公司、旗昌洋行等。為了保持在遠東的這樣一個基地，西方諸國在這裏苦心經營，他們不惜耗費巨資，引進西方的許多技術手段，使上海在當時基本達到了與先進國家相差並不太遠的生產力水平。這與當時中國其他城市相比，確實令人驚嘆，以致於向來優越於上海的杭州、蘇州等城市，在十幾年間迅速被上海趕上並遠遠甩在後面。人們慨嘆：「六十年前的一片蘆葦灘頭，變做了中國第一個熱鬧的所在。」^⑬

上海已成為一個展示國際、國內風雲的舞台，它的成長甚至超過了開埠初期殖民者對它的期望。

當太平天國向英、美等國宣布「保護洋商在長江上的航行」以後，頓時引來了世界各國的商船，上海出現了世界近代航運史上罕見的奇觀。因為當時從上海至漢口的運輸利潤，居然要比從上海到倫敦的高出四倍。這也給上海近代造船業的崛起帶來必要的條件。

作為政治「後院」的上海

大致在1862年前後，上海已基本完成了它崛起的過程。

西方的觀察家這時對上海已非常熟悉了。他們對1862年進行了這樣的評價：「這顯然是中國政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對之一一敘述，那要寫成多卷本的書。」並斷言：這年全中國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的焦點都在上海，或與上海密不可分。上海已成為中國最活躍的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舞台^⑭。應該承認，這種評論還是符合歷史實況的。

這年，由於太平軍連年對江浙進攻，上海人口因大批難民湧入而急劇膨脹。儘管民眾龐雜為上海帶來了饑饉、瘟疫、火災，但同時，也逼使上海最終突破了租界、上海縣城華洋分而居住的局面，形成「華洋雜居」^⑮，正式構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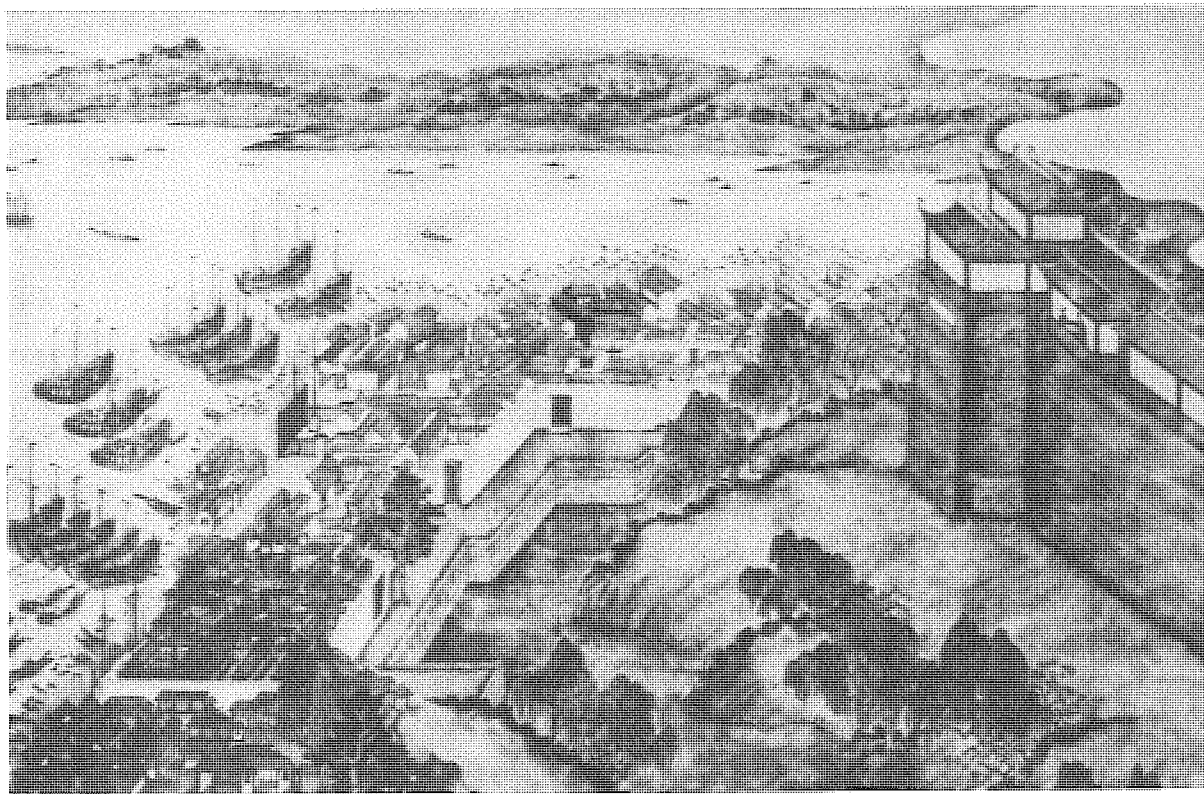
1862年，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自上海啟程出訪歐、美。北京—上海—目的地，幾乎成為以後中國外交官及其他人士出洋的固定路線。而當後來日本強大到要問鼎太平洋的時候，也是首先將目光盯住上海。上海自那時起，已成為中國與外國、列強與列強、列強與殖民地等諸種國際關係的樞紐。

近代上海社會生活的基本格局，並由此奠定了近代上海城市形態的主要內容。

同時，這年西方諸國與清帝國首次實現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的「和解」，並進而合作鎮壓太平天國。因此，上海道吳煦發給幾十家洋行通商執照作為回報，准許他們進入中國內地。一名美國記者為此欣喜若狂，他宣稱：外國將在上海與兩億中國人做買賣。而正是在這種狂熱的貿易浪潮中，確立了長江流域—上海—世界市場的關係。1862年，從上海運出了8,500包生絲、6,000萬磅茶葉、23萬擔棉花。上海在這些主要出口品貿易中的地位，一直延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此外，上海亦成為遠東的政治敏感地。這年，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自上海啟程出訪歐、美。北京—上海—目的地，幾乎成為以後中國外交官及其他人士出洋的固定路線。除了技術上的原因之外，在上海的洋場上感受異域氣氛，搜集情報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久而久之，上海實際上成為中國外交舞台的「後院」。上海談判、北京簽約的事例屢見不鮮。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第一件大事也發生在這年。日本官方代表首次乘官船「千歲丸」抵上海，清方負責有關外交、外貿事務的上海當局與之接洽談判。在此之前，中、日兩國之間僅存在「非法」的民間貿易，自此，近代中日兩國正式通商。作為西方諸國在遠東的基地，上海也成為很多政治活動的舞台。例如，英、法等國艦隊是從上海起錨去日本，簽訂了類似〈天津條約〉的通商條約，由此打開日本門戶的。而當後來日本強大到想要問鼎太平洋的時候，也是首先將目光盯住上海。英國打開朝鮮門戶的主要籌劃、準備活動都是在上海進行的，由此得以在1883年6月26日簽訂〈英朝條約〉。綜合這些關係，我們有理由認為，上海自那時起，已成為中國與外國、

上海開埠圖



列強與列強、列強與殖民地等諸種國際關係的樞紐。這也是上海有別於其他經濟中心城市的一個重要之處。也正是因為上海城市內涵的豐富，因此，基於各種利益的考慮，它往往被處於「保護」之中。這種「保護」又常常是通過「和平共處」來體現的，所謂「利益均沾」的原則，在上海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

註釋

- ① 〔美〕洛茲·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中譯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② 〔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譯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 ③ 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④ 例如濱下武志、劉廣京、徐新吾等人的研究。
- ⑤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卷1（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35-36。
- ⑥ 黃炎培：〈關乎上海租界開始年期之史科〉，《人文》，第6卷第1期。
- ⑦ 茅伯科主編：《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頁92。
- ⑧ 應寶時等修，俞樾等纂：同治《上海縣志》，卷2〈海關〉（上海，1871）。
- ⑨⑩ 柏納德：〈納米西斯號航行記事〉，轉引自註⑦，頁96。
- ⑪ 蔣廷黻：《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咸豐朝第2冊，頁1。
- ⑫ 關於這一判斷，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見，主要的問題是統計口徑上的誤差。
- ⑬ 阿禮國：〈1854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載《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頁1-2。
- ⑭ 黃葦：《上海開埠初期對外貿易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142，附表4。
- ⑮ 參見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 ⑯ 黃逸峰：《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70。
- ⑰⑱ 轉引自于醒民、唐繼無：《從閉鎖到開放》（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頁67。
- ⑲ 《北華捷報》1864年1月9日社論。
- ⑳ 參閱註⑦，第五章。
- ㉑ 我佛山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楔子（廣州：花城出版社，1988）。
- ㉒ 《北華捷報》1863年1月3日。
- ㉓ 王韜：《瀛壖雜誌》，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朱 弘 198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及上海史研究。從1988年至今，擔任《上海研究論叢》的責任編輯，現為上海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上海研究中心）編輯，曾發表〈太平軍一戰上海散論〉、〈海派文化論〉等論文多篇。